

# 以中国式现代化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

赵建军

**摘要:**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作为区别于西方现代化发展的中国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克服了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危机,以及由于人与自然关系失衡所产生的诸多社会问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涵与本质特征。通过对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问题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政治主张上与西方生态现代化截然不同,这使得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历史语境中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成为超越西方生态现代化的理论形态和实践范本。中国式现代化集全党意志、集国家力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永续发展,就是走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之路。

**关键词:**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生态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D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3)01-0012-06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sup>[1]23-24</sup> 从中国式现代化本质最终指向上,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可以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要实现超越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所形成的工业文明,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最终目标,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应在中国式现代化众多内涵中具有突出的位置,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本质。

## 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

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中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马

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鲜明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的,在生产力的进步性上,人类的生产活动必然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sup>[1]49-50</sup>。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问题的理解上,要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升至突出重要的标志性特征地位,并从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不同于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中国道路高度进行理解。在世界现代化过程开启的历史进程中,无论哪个领域的巨变最终都是通过经济社会的发展来实现,其中蕴含着对于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的不同理解与选择,而其中也反映出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

收稿日期:2022-11-1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绿色发展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21AZD059)。

作者简介:赵建军,男,南开大学—中国社科院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教授(北京 100091)。

差异化认知。正是看到了生态环境对于现代经济增长的阈值,现代化所依赖的自然物质条件使得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在人与自然的关系维度做出重要的突破。只有如此,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推动世界历史从西方现代化所创造的工业文明向中国式现代化最终朝向的生态文明实现转换。因此,在人类社会的大历史视野中,中国的现代化要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内涵,推动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换,以此创造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首先,从生态文明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突出重要地位来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本质特征与重要方向。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众多内涵之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突出重要的地位和意义。一方面,由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话语组成,是中国共产党关于人与自然关系问题认识的重大理论创新;另一方面,人与自然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生态文明建设处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与艰难之处,就在于要摆脱对欧美国家现代化的路径依赖,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布局中经历了从提出建设“四个现代化”,到提出“‘两个文明’到‘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再到今天提出的‘五位一体’”<sup>[2]</sup>的变化历程,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把生态文明建设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战略地位,其核心就是要求中国的现代化既要朝向共产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又应当基于我国生态制约的现实,从根本上解决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生态转向。回顾和反思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的历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拓展到“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的高度,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根源与基础上将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内容实现贯通,从世界观与方法论上打破了资本主义工业现代化的二元对立思维局限。此外,从中国式现代化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五位一体分布,以及中国式现代化

本质的落脚点在于致力于推动形成人类文明新的形态来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一定意义上已经超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其他四个内涵。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为重要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中国的伟大成就,也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是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动实践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中国化与时代化,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性本质。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是思维方式的一种表现,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主观思维与客观世界遵循同样的唯物辩证规律,因此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自然的客观实在也具有历史社会性。中国式现代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其本质上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自然观视角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做出的社会历史考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强调要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承认自然的现在性,即把历史范畴上的社会生产看作是建立在自然界所提供生活的资料和劳动对象,而且也提精神食粮。进一步的,马克思指出:“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sup>[3]128</sup>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洞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业生产中自然界与人之间的分裂,人与人的关系的异化。正因为如此,作为一种与资本主义发展相区别的社会发展模式,中国式现代化由于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从根本上实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复归,因而才能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协调,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同步推进。也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过程中才得以实现人的类存在本质。正是由于历史唯物主义中的自然是作为关系的自然,包含着人与人、任何社会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也才能够在本质上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所以,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人与自然关系,既有本体论意义上的内涵,还有人类学以及经济学上的意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理应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性本质。

最后,中国通过生命共同体的价值理念,从价值根源上对西方工业文明中的现代性危机做出回应,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归宿。资本主义通过大规模工业化迈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表明,西方现代社会基于“主客二分”思维所

形成的价值观对科技理性的过分崇拜,忽视了自然的内在价值,形成了资本宰制下的现代化工业文明,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成为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的根源。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本质上强调了构建一种新的哲学价值观,在对待人与自然关系中的环境问题时,避免了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观点的冲突,不主张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对人与自然做价值排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来自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既克服了以笛卡儿为代表的实体哲学,也打破了非此即彼的“二元论”思维,有效解决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环境问题。特别是以生命共同体为代表的哲学思维,强调了自然万物共同具有的内在价值,将人类的发展与自然的存在协同,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内在地形成了协调自然空间与社会空间物质能量变换的方法论。此外,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建设绿色家园作为人类的共同梦想,并形成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的全球倡议可以看出,在国家战略层面实现了世界范围内的发展观转变。可以看出,思维方式的东方转型和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为化解现代性危机提供了有益的价值遵循及实现路径。总的来说,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通过人与自然的共生实现社会价值与自然的价值共生,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驱动,在本质上重新定义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归宿。

## 二、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问题： 两种理论的共识与分野

作为一个历史范畴,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运动,从工业文明开始到现在已经持续 300 多年。这期间,人类凭借自己的理智不断获得新的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不断发起向自然的进军,一心一意地要为自己在地上建造起人间天堂。美国当代学者艾恺(Guy S. Alitto)用“擅理性,役自然”概括西方现代文明的实质,即通过高度发挥人的理性功能,凭借科学技术,驱使自然服从于人类的意志<sup>[4]</sup>。应该说,西方现代化路径是技术理性统治下的“主客二分”思维方式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历史性表现,割裂了人与自然的天然联系的西方现代化也使得生态危机、生态灾难成为西方现代化的必然产物。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的全球范围内的扩张,生态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唐纳德·休斯在《世界环境史》中写道:“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工业

发展所造成的生态系统变化增加了一些曾经闻所未闻的成员,诸如铀和其他放射性废弃物、不可降解的杀虫剂、氯氟氢、塑料、人工合成的信息素和激素,以及其他种类的成千上万的工业化学品。”<sup>[5]</sup>1962 年美国学者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寂静的春天》和 1972 年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以及一些类似著作的出版,反映出环境问题与经济增长同时成为生态主义者反思西方工业化进程的重要问题,并极大引发了政府和社会的关注。其中,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源环境保护运动可以看作是世界现代化发展的转折点,标志着人类社会开始放弃不计环境代价追求经济增长的社会发展模式,转而寻求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也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开始真正关注社会发展中的生态问题。

作为一个概念,生态现代化首先兴起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德国,由德国学者马丁·耶内克和约瑟夫·胡伯提出。最初,生态现代化初始只是在“柏林学派”的学术团队中使用,后来逐渐从柏林走向整个德国,从学术圈讨论变成执政党的基本政策(欧洲绿党)。20 世纪 90 年代,这一概念已经在国际上被广泛使用。生态现代化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sup>[6]</sup>:第一个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的特征是主张“科技万能论”,以胡伯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工业化国家依靠不断的科技创新,就可以成功解决其环境问题。但胡伯的理论很快遭到了其他环境主义学派的尖锐批判。生态现代化理论家随即对最初的观点进行调整。第二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的理论特征可以概括为“社会因素论”,学者们对原来所坚持的科技创新在生态现代化中的核心作用进行反思,对于生态转型过程中国家机构、市场、非政府组织、文化制度等要素在其中的作用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和论证。第三个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的理论特征是主张“全要素论”,除了对生态化生产及其要素进行分析外,也开始倡导生态化消费,并进一步对全球问题、欧美工业化国家之外的环境问题有所涉猎。生态现代化是为解决西方工业化、现代化所遭遇的一系列环境问题而提出的理论,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技术和社会等诸多领域,在工业文明的大历史尺度上,保持着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解决环境问题的生命力。因其有效性,所以其受到了环保主义、生态主义、可持续发展理论等社会思潮的影响,并为后续世界的绿色化发展浪潮提供了经验借鉴。

整体上看,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提出现代化过程中的生态问题主要有两大解决路径:一是对经济发展中的环境问题保持技术乐观主义的现代化态度,并不是其作为资本主义工业化不可避免的后果,而是对社会、经济、技术改革的挑战,试图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中找到出路;二是从现代社会的制度转型寻找解决路径,包括科学和技术、生产和消费、政治和治理。这也成为中国和西方在应对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问题形成共识与分野之所在。从共识性来看,对于工业社会发展,中国与西方社会已经形成共识,如环境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制约的客观性,现代化前景的乐观性,在理论建构上的反思性,以及理论的实践指向上。这些共识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都以特定的形式得到不同程度的体现,如中国在基本国策上强调的环境保护与生态治理,提出作为国家意志与政党理论的科学发展观与“两型”社会构建等,都是在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与环境治理模式,利用科学技术与社会制度从源头上防治环境污染和破坏,找出一条环境和经济双赢的发展路径。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以后,在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如何实现高质量的发展,中国也在发展理念上进行创新,实现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经济社会绿色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发展方向。

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可以看到,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提出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起步阶段,学习、借鉴、追赶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与实践中的主要任务。在中国现代化后发优势的同时,压缩时空的追赶发展也让中国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即生态环境问题在经济粗放快速发展过程中集中暴露出来。恰好此时的生态现代化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条“从源头防治生态环境问题”的现代化道路和可供选择的政策手段。从对西方可持续发展理念、新经济模式无保留引进吸收,到创造性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也就成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必然。可以看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一个从模仿到创新再到超越的过程,中国的现代化理论来源于这个伟大的实践。然而,面对发展过程中的生态问题,西方生态现代化的理论及其路径不可能一直有效,在经历效仿之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从自身的文化传统形成的基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理论,在文化、政治与经济的领域与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具有区别,体现出不同文化传统、政治体制之外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之处。

由于在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上的差异,中国的现代化理论在应对生态问题上与西方存在本质区别。需要指出的是,西方生态现代化没有触及理性——技术理性本身,是一种相对保守的绿色变革理论,其根本宗旨在于在不触动现存社会制度(尤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通过革新技术、增强公众的环境意识、改善国家的行政管治与市场经济手段等,以改良现代工业文明,尽可能减少现代化进程中的环境负效应。这种粉饰与修正在现实表现上可能有助于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制度与生产模式得以一定程度的延续,但资本宰制之下的制度内生矛盾终究无法克服,并引发了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多重危机。因此,如何从社会历史环境角度看待技术,如何在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做出协同,以及如何认识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制度差异,需要新的思维方式与哲学价值观,在内省与辩证之中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推动形成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而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领域,通过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正是理论创新在实践探索中的生动体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健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我们的祖国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sup>[1]</sup><sup>11</sup>正是这种将生态文明建设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方面与全过程的实践,使中国形成了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重要理论特质和实践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 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 中国超越西方生态现代化之路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东西方力量对比之变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较量。环境问题是当前世界各国面对的共同性问题。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让资本主义国家生态危机频发,仅靠科学技术应对这种与发展模式、与社会政治紧密关联的共生性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回应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危机,中国式现代化理应

在自身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中做出哲学观念与价值根基上的变革,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调整国家事务的战略谋划,实现对西方生态现代化道路的超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理论相对于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立足于我国自身实际的需要,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生态智慧的融合,更是体现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现代化的鲜明政治优势体现。在此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特征性本质,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上对西方现代社会的发展进行反思,成为超越西方生态现代化的新的发展模式。

首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汲取了中华文化的传统辩证思维方式,以生态智慧作为滋养,在世界观与方法论上消除了人与自然的对立。如果将现代化理解为从传统迈向现代的社会变迁过程,那么这种变迁不仅是一个全球化进程,更有着民族性的特征。这种变迁是诸多复杂因素作用的结果,如经济、科技、政治、文化等,相对于经常变动且具有显著外在表现的经济和政治因素,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等内容相对隐蔽,更具持久性,恰恰是这种更为韧性的要素才使得地方性的现代化进程表现出自身的优越性。“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sup>[7]</sup>反思西方现代化与生态化之间的矛盾,其背后的西方文化价值传统与思维认知方式是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内生缺陷,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之际”的生态模式和文化图景,在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上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理论提供了认识论与方法论的优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超越了西方工具理性以技术视角看待环境的局限,在工具价值、内在价值与系统价值的多重视野下讨论环境如何能被可持续地利用,思考人类社会发展中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因此也超越了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传统,表现出一种在哲学层面上的优越性。

其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强调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根基,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协同可持续提供了政治保障。马克思主义是在对象性范畴中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这种对象性是以主客体的双向互为前提的,保证了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人是作为自然的对象性存在。对此,马克思指出,人作为一种类存在,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这使得人对于自然的依赖表

现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sup>[3]95-96</sup>。如果忽视了人与自然共生的关系,人类社会也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自然环境基础。更进一步,马克思主义强调生产力对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而这种物质生产“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sup>[3]92</sup>。可以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而资本主义制度则破坏了这种共生关系,以牺牲生态换取经济效益的增加,即便生态现代化理论提出的“环境保护同样具有经济价值”,也难以掩盖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质。同时,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社会历史范畴中的人的关系最终也可以还原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因而相对于自然的可持续现代化进程,人类才是人类社会实现超越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与逻辑必然。也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是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基础上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强调共产主义社会中的“自由人联合体”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反映的也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在制度上通过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的社会主义。因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可以超越西方的生态现代化模式,真正实现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自身的和解。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而形成的理论成果和经验总结,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注重同步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sup>[8]</sup>。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可以说,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立足于我国的特殊国情逐渐探索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推动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范式转换。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一个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社会向先进文明迈进的过程。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提出,到现代化发展的“三步走”战略,再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提出,特别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制定,党和国家事业的战略规划不断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通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的是经济社会发展在生产力上的优势,实现了全体人民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上的共同富裕。现代化

是人类社会不断迈向文明的历史进程,其内在动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改革开放后一个时期内,我们形成过传统单一追求速度外加规模扩大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和发展模式,尽管带来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但也积累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生态文明作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也表明了我们所形成的中国式现代化必然是要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因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已经不仅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所要达到的最终状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人从文明的高度看待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探索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使中国实现了全面小康,历史性地消灭了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问题,中国经济呈现持续向好的高质量发展势头。可以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涵,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生命力。

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以生态文明建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社会与自然界永续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从效仿西方到实践创新,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已经实现用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多重发展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的单一工业化发展。特别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有效回避了西方现代化模式在因制度缺陷带来的反生态问题,因而表现出历史与逻辑上的合理与科学。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坚定不移地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归根结底要实现的是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和解,实现自由全面发展,最终指向现代化发展成果的人民共享与世界贡献,成为中国化与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359.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4] 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6.
- [5] 休斯.世界环境史:人类在地球生命中的角色转变[M].赵长凤,王宁,张爱萍,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215.
- [6] 莫尔,索南菲尔德.世界范围内的生态现代化:观点和关键争论[M].张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4-5.
- [7] 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246.
- [8] 习近平.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281-282.

## Accelerate and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with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Zhao Jianjun

**Abstract:**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s a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led by the CPC. It has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ization in all countries, as well a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its own national conditions. As a Chinese road different from the Western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has overcome the ecological crisis in the process of capitalist modernization, as well as many social problems caused by the imbala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he modernization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s an important connotation and essential feature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ecological issues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modernization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the Western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in the way of think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propositions, which makes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show strong vitality in the context of world history and become a theoretical form and practical model that transcends the Western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gathers the will of the whole Party and the strength of the state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realiz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 which is to take the road of building a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Key words:** the modernization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责任编辑:思 齐